

从孔府档案看民国时期曲阜孔庙修缮

刘海霞 杨金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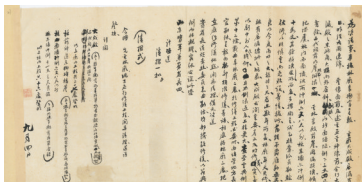


图1《孔府档案》第01-008010-0022-0001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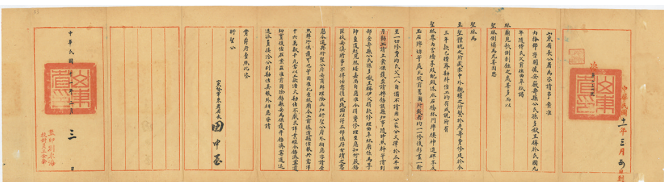


图2《孔府档案》第01-008010-0027-0001卷



图3《孔府档案》第01-008014-0001-0001卷



图4《孔府档案》第01-008017-0031-0001卷

夏令，伏雨盛行，不但危及圣像，且恐抱柱折断，立见倾圯……两殿工程均甚紧要，寝殿尤属刻不容缓。传闻各省汇到捐款已有数万万元，可否先行就款将两殿择要兴修，以防不虞”(图3)，从本欲大修孔庙退而择要兴修。虽然1924年7月成立了曲阜圣庙后寝殿工程处，随后也下发了第一批工程款，但是由于曹錕下台，以及首批工程款使用问题引发了合同纠纷，这次重修不久陷入停滞。

1925年，张宗昌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兼山东省主席，曲阜孔庙的修缮又迎来转机。张宗昌与衍圣公府素来交好，在其主政山东后不久，执掌孔府的陶氏夫人和年幼的孔德成前去谒见，孔庙修缮获其支持，“督办兼省长张面囑公太夫人，上公回曲阜赶紧筹集包工人勘估，一面动工兴修，一面呈报立案以免误时”(图4)。由此，孔庙修缮工程复又启动。但是由于此时浙奉战争爆发，交通不便，修缮工程频频出现停工停料。1928年山东政局变化，导致后续工程再难持续，而尚未结清的工程款亦无法支取，从而再次出现合同争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孔庙修缮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曲阜成为了蒋阎大军的主要战场之一，孔庙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孔庙修葺象征新政权合法性，国民党实权派的尊孔活动为修庙迎来了转机，孔庙修缮再度进入公众视野。1931年初，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以保存名胜和维持文化的名义，提出修复孔庙。中原大战后，孔庙损毁严重，经山东省建设厅初步勘察，如欲大修，用款估计颇巨。因孔庙修缮工程浩大，省库空虚，仅凭一家之力，恐难承担如此重任，山东省政府只能效仿曹錕之举，再次拉开孔庙募捐兴修的大幕。孔府档案记载，“修筑曲阜孔庙孔林颇为一般人注目，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对于此事尤为注意。日昨特由曲阜来电，向省政府询问修理孔庙办法，以便就近与孔族及衍圣公孔德成等有所协商。山东省政府第四十五次政务会议决由省府电请党政军各要人发起募捐，修筑孔庙”(图5)。募捐倡议发出后陆续收到少量捐款，主要来自山东各县市以及河南、湖北、四川等处。后虽经政府多次布告，截至1933年底，捐款数额不多，这与彻底修缮孔庙，甚至想借此机会扩大范围，将孟庙、颜庙、子思庙同时修理的愿景相差甚巨，而南京政府原拟赞助的补助费亦未能拨付到位，曾答应捐款的国民党要员也大多虚应故事。无奈之下，1934年1月27日，韩复榘电请蒋介石拟将募捐到的款项转为修繕战争中间同样遭受重创的颜庙，历时六个月将颜庙正殿修缮完成。韩复榘积极筹划的孔庙募捐活动告一段落。

1934年8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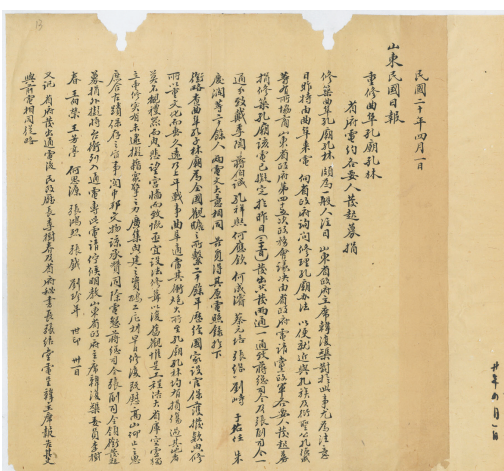


图5《孔府档案》，第01-008431-0009-0001卷

市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庆典，正式向外界发出尊崇儒儒的信号。在此背景下，孔庙的修缮再次得到推动。由于对筹款方式有争议，加之对韩复榘上报的孔庙维修金额略显质疑，国民党政府决定亲自主导此次孔庙的勘估，具体由行政院牵头，内政部和教育部落实，山东省政府配合。选聘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学社组主任，有中国近代建筑之父之称的梁思成为此次曲阜孔庙修葺工程的总设计师。

1935年2月，内政部汤文聪、教育部靳灵秀、梁思成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建设厅工作人员等共同前往曲阜勘察孔庙。此次孔庙勘察测绘从前期准备到设计工作结束，历时近半年，共计测绘孔庙大小建筑平面图40余处，拍摄照片320余幅，编制出被后世奉为古建修缮方案标准范本的《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次测绘完成不久，1935年7月山东遭遇严重水灾，黄河在鲁西鄆城一带决口，超五百万人无家可归。赈济灾民和黄河河工尚需一千五百万的巨额资金，本来就有争议的孔庙大修工程由此被搁置下来。兼之全面抗战随之爆发，梁思成等人精心设计的《孔庙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曲阜孔庙修葺工程历时十余年而以失败告终，期间多方势力呼吁与催促，并多次勘估曲阜孔庙，不断修改筹款方法，看似声势浩大，但直至最后都未能集齐百万余元的款项，曲阜孔庙修葺总工程从头至尾并未真正展开。这个过程中仅有的成果多为山东当局取得，即自行拨款修复孔庙寝殿及同文门、奎文阁前碑亭等并整修颜庙，而需南京国民政府整体把控的总工程却多口惠而实不至，终成一场“闹剧”。

(第一作者单位:曲阜市文物局;第二作者系孔子博物馆副馆长)

预防性保护(PC)是使文化遗产可持续保存并传承的核心策略，自20世纪初在国际上萌芽，于21世纪初引入中国并不断发展。新时代背景下，需深化对预防性保护的系统性认知，结合我国文化遗产现实保护需求，推动预防性保护体系本土化，将国际经验转化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路径，为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每一处古迹或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明确强调“提升预防性保护能力”，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从“抢救性保护为主”转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少基层文博单位预防性保护的理念与方法体系有待加强。据此，本文将在考察预防性保护理论的引进历程以及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现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该理论，并结合国际最新案例，探索新时代背景下适合中国国情的预防性保护系统应用的路径。

预防性保护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现状

预防性保护理论于21世纪初引入中国。国家文物局于2003年在甘肃平凉市博物馆和湖北武汉市博物馆实施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达标建设示范工程，开启了预防性保护的试点探索。正式提出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是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通过“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研究”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系统提出了中国预防性保护技术的核心内涵。2018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强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明确将预防性保护作为文物保护的重点任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5年3月施行)将预防性保护纳入法律框架。故宮博物院于2008年启动遗产监测方案，2011年成立世界遗产监测部，标志着预防性保护在大型文博机构中的制度化实施。西安城墙打造的“数字方舱”推动文物保护从“抢救修补”迈向“智能预防”。我国预防性保护工作已构建起“国家—地方—机构”三级体系，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和工作人员对预防性保护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缺乏系统性思维和全局观念，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重视硬件设备的购置，而忽视了预防性保护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而在一些基层地区，甚至都没有相关的保护性配套设施和系统，也缺乏专业的预防性保护人才队伍，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执行力度十分有限。新时代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变；公众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对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展示和利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我们 also 需在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预防性保护理念的认识，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体系。

国际应用实践与预防性保护理论的再认识

1930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文物保护会议上，首次提出了通过控制博物馆环境(如温湿度、光照)延缓文物劣化的理念，标志着预防性保护的萌芽；1963年，切萨雷·布兰迪在《修复理论》中系统阐述了预防优于干预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伯纳德·费尔登提出预防性维护概念；90年代末，斯特法诺·戴拉·托雷提出计划性保护；2003年沃勒在《文化财产风险分析模型》中提出开发预防性保护系统并应用于加拿大自然博物馆的案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2010年发布《结构设计基础——既有结构评定》，该标准涉及及对既有结构(包括文化遗产建筑等)的评估，可应用于文化遗产结构方面的风险管理；2016年，加拿大文物保护中心(CCI)与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中心(ICCROM)联合出版的《ABC法——一种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的风险管理方法》涵盖了文化遗产建筑在内的结构评估，为降低遗产风险、实现有效保护提供了最新的系统性思路和方法。

2019年由Prieto、Ortiz等人介绍了一种创新的方法，基于人工智能模型的城市中心遗产预防性保护渐计算工具：Art-Risk 3.0。Art-Risk 3.0是一个文物风险管理 with 保护的免费人工智能平台，该平台融合地理信息系统地图中的空间数据与专家评估，以识别遗产建筑所面临的背景威胁水平和脆弱性程度，评估遗产建筑风险，这种方法能够管理建筑物的脆弱性、风险和功能使用寿命，为业主、地方、区域和国家管理部门提供基于实证数据的风险依据。到2023年，该人工智能平台开始受到国际关注。2024年，Ouaili Samia和Anouche Karima通过对姆扎拉山谷(Ge M' Zab Valley)的案例研究，提出社区参与对预防性保护的关键作用。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会可持续性，强调了社会因素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中的重要性。2025年2月，一项名为Heritage Watch AI的计划在巴黎启动，由法国文化部在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宣布。该计划旨在通过结合卫

星图像、3D建模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全球文化遗产提供实时保护数据。2025年6月20日，中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动态监测与风险评估”项目会在武汉大学顺利召开，该项目深度融合遥感测绘、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构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智能探测—知识挖掘—动态监测—风险评估”的技术体系，研发文化遗产动态监测与可持续发展利用平台。这与意大利国家级的“Risk Map”项目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十年，物联网、AI技术与建筑信息模型(BIM)/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融合，推动预防性保护从“人工定期检查”转向“实时数据驱动决策”的智能化升级。纵观预防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可知，预防性保护并非单一的技术理论，而是以理念要义为统筹、以技术支撑体系为框架所搭建起来的遗产保护体系，其要义在于：将保护重心从问题发生后前移至风险发生前，在风险发生前进行识别与控制，并对整个过程进行科学的监测与评估，预防性保护不仅仅强调数据化和智能化，更注重的是对数据做出风险前置应对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就技术支撑体系方面，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高精度、低扰动监测技术是基础。运用无线传感器网络(WSN)、光纤传感(FOS)、微环境监测仪等监测手段对温湿度、光照、空气污染物(SO₂、NO_x、VOC)、结构位移/振动、虫害活动等各项参数进行实时、连续、远距离监测，并采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与传输。这一点国内已做出相关的研究和应用(2011年)。

多源数据分析与风险评估平台是关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建筑信息模型(BIM)把监测数据、遗产本体信息、历史修缮、环境地理信息等统一采集进系统，形成数字化的“遗产健康档案”。基于大数据分析能力和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异常识别、劣化趋势分析和风险等级量化的多源数据融合与平台建设。鉴于此，国家顶层设计，统一标准及强制性预防保护制度是预防性保护落地的重要保障，而动态的监测数据则是实现资源精准投放的科学依据。

预防性维护决策系统是核心。在开展风险评估后，以该遗产的价值、材质特点、成本为依据，生成具有特色的预防性维护计划，包含定期巡查、微环境控制、预防性虫害治理、客流控制等，明确干预优先级、周期与方法，严格执行科学决策下的预防性维护方案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保护。

李双双

公众参与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的重要补充。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开放部分数据，既能吸引更多群体的关注，又能提升公众的保护意识。

要发挥预防性保护的效益，需紧密结合本国国情，走出一条特色化路径：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需进一步强化预防性保护的责任主体，强制检查周期及预防性维护要求；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项资金、文保科技专项中，可以明确划拨预防性保护系统建设与运维的固定比例，鼓励地方政府配套。

实施分级分类管理，避免“一刀切”，国家级重点单位可覆盖全面，完善的预防性保护系统，省级及以下单位可用移动巡检的方式先构建关键的风险点如木结构建筑承重节点、库房核心区等，逐点采取进行分析并制定对策，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从而发展并完善自己的预防性保护平台。

培养“文物医生”队伍，在高校文保专业增设预防性保护课程，在国家级科研机构建立预防性保护培训中心，为基层文保所、博物馆培养兼具数据解读、风险评估与基础维护技能的“文物医生”，探索“区域办+中心”模式，以省或市为单元，搭建“预防性保护技术服务中心”，为辖区内中小型文博单位提供设备租赁、数据托管、远程分析、风险诊断、维护方案设计等技术支撑服务，补齐其技术力量短板。

开发“文物健康”APP，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向公众适度开放部分非敏感的监测数据，并设置“隐患上报”通道，鼓励公众参与；强化阐释性展示，在博物馆、遗址公园设置专门区域，运用可视化手段，生动展示预防性保护的原理、作用与成果，讲好“防患于未然”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故事，增强公众认同感，提升公众参与和价值传播。

预防性保护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潮流。主动干预、风险管控、数据驱动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中国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国家发展蓝图之中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及路径的要求。因此，推动预防性保护在中国落地生根至遍地开花，构建“国家平台支撑—分级分类实施—区域协作服务—公众参与共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性保护体系，赋能基层保护，加强遗产保护预测性、精准性与科学性，对于缓解当前保护压力、化解“保护性破坏”问题迫在眉睫，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长期保护、长久保存，赓续中华文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赓续长征薪火 绘就三明新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三明段)建设成效与创新实践

黄敏 邱明华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的国家战略工程。近年来，三明市立足全域苏区、长征起点的独特禀赋，以系统思维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三明段)建设，在资源保护、文化传承、产业融合、区域联动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了“三明样本”。

全域统筹，构建“红绿古”协同的空间新格局

一是战略规划引领全域覆盖。以“长征出发·撤离苏区”为主题，创新构建“一线一核两区”空间体系(一线：长征历史路线；一核：宁化核心区；两区：宁化等5县主体区+永安等6县延伸区)。三明段拥有长征文物点227处，占福建省总量的41.88%，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4处，形成全省最密集的长征文物群落之一。二是项目攻坚夯实空间载体。宁化作为全省两大核心建设县之一，高标准建成“一地一带两院两园”空间骨架(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安乐一曹坊示范带、长征学院及陈塘红军医院、淮土与曹坊核心展示园)。截至2025年6月，规划内17个项目全部开工，竣工16个，凤凰山长征出发地等核心项目入选国家级重点展示园。三是政策赋能破解要素瓶颈。成立县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宁化县长征出发地遗址保护中心”，组建文旅融合攻坚专班，累计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专项债等破解用地、资金等难题，创新“红绿古”三色融合模式，打造“景区带村”示范样板。四是分级保护筑牢资源根基。借力首批长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契机，争取国家文保资金，系统性修缮凤凰山出发地旧址群等28处革命文物，完成5处旧址陈列布展。建立“国一省一县”三级文旅联动机制，实现227处长征文物动态监管全覆盖。

活态传承，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新高地

一是科技赋能重构历史场景。运用数字化技术复原7处革命旧址，打造《军号嘹亮》主题展、《风展红旗如画》情景交响诗剧(国家大剧院上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推动“静态陈列”向“动态参与”转型。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年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二是实景教学深化精神浸润。宁化长征学院首创“情景课+实景教学”双轨模式，开发“重走筹粮路”等8条精品路线，串联20个核心教学点、100个红色微课堂，累计举办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5万人次，获110家单位挂牌教育基地。三是步道体验激活历史记忆。建成国家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步道宁化段”，推出“重走长征路”研学产品。依托步道开展红色马拉松、自行车公开赛等30余项活动，年均吸引参赛观赛者超10万人次。四是民间叙事丰富文化表达。收集客家“送郎当红军”民谣、湘江战役口述史等民间记忆，在安贞堡、土堡群等古建中植入“军民鱼水情”场景叙事，形成“革命精神—客家文化—建筑遗产”三维叙事体系。

融合创新，培育“三色共生”产业新生态

一是核心引擎强链增效。凤凰山长征出发地、下曹旧址群创成国家3A景区，带动红色场馆集群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年均增15%。打造“场馆教育+户外拓展+红色研学”三位一体模式，衍生文创产品32类。二是“红绿古”资源深度融合。串联客家祖地、泰宁丹霞、尤溪梯田等资源，形成“红色研学+客家民俗+生态康养”产品矩阵。创新开发“红色粮仓”文旅路线，宁化“千担纸、万担粮”史迹成为特色IP。三是赛事经济激活乡村。年均举办省级以上红色赛事超5场，累计承办红色运

动会、马拉松等30余项活动。淮土镇红军街引入14家“红民宿”“红文创”业态，带动周边村民人均增收4000元。四是品牌矩阵扩大影响。打造“万里长征起点·风展红旗如画”区域标识，2024年宁化县旅游总人数、收入同比增长13.5%和15%，革命老区焕发新活力。

区域联动，构建长征文化传播新平台

一是高端平台凝聚共识。成功举办“长征沿线红色旅游城市联盟工作会暨开园仪式”，联动14省(区、市)40城共建资源共享、线路共推机制，确立宁化在长征文旅格局中的枢纽地位。二是媒体矩阵放大声量。开园盛况获人民网、新华网等10家中央媒体深度报道，推出《风展红旗如画》专题片，全网传播量超500万次，“最远长征起点”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三是全国培训深化辐射。依托长征学院及15个现场教学点，吸引110余家国家级单位设立教育基地，年培训党政干部超3.5万人次，成为全国红色教育“打卡地”。四是价值转化赋能振兴。通过品牌溢价带动客家米酒、竹纸工艺等非遗产品销售。通过“红土地”变“金饭碗”的实践，为革命老区振兴提供可复制路径。

红色沃土，书写时代新篇

三明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红色引领、绿色打底、古色增韵”的融合发展之路。未来将持续深化革命史料研究阐释，拓展区域合作深度，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为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三明智慧。

(第一作者单位：三明市文物保护中心；第二作者单位：宁化县长征出发地遗址保护中心)